中国近代史丛书

太平天国革命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中国近代史丛书

太平天国革命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
太平天国革命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（上海绍兴路5号）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　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开本 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 3.75　字数 71,000
1973年6月第1版　1973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500,000
统一书号：11171·40　定价：0.21元

毛主席语录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

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，一百年来，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，前仆后继，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，是可歌可泣的。

编写说明

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，我们编写这套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，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，以供阅读参考。

这套丛书，包括重大历史事件，如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革命等，以及若干近代历史人物，陆续出书。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。

我们这个编写组，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。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，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，甚至可能存在错误，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目　录

一、风暴前夜…… 1
二、洪秀全和拜上帝会…… 8
三、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……17
四、建都后的措施……27
五、北伐和西征……37
六、打垮江北、江南大营……46
七、天京的变乱……52
八、防御中的攻势和“新政”的提出……57
九、天京再次解围和大军东进……65
十、安庆保卫战前后……73
十一、和外国侵略者对阵……81
十二、革命形势危急……89
十三、天京陷落…… ……96
十四、再接再厉的斗争…… 104
十五、太平天国英雄们永垂不朽…… 108

一、风暴前夜

"不论盐铁不筹河，独倚东南涕泪多。
国赋三升民一斗，屠牛那不胜栽禾！"

这是著名思想家、诗人龚自珍，在一八三九年即鸦片战争前一年写的一首诗。这首诗的意思，是说清朝统治者不去讲求盐铁生产事业，不去兴修黄河水利，只知榨取东南各省的财富，每亩田定额税米三升，经过官吏的层层勒索，人民竟要缴纳一斗，以致无法生活，愤激到还不如把耕牛杀掉另寻出路的好。这里的"东南"，是指长江下游的富庶地区，清朝政府的漕粮主要是取之于这个地区。所谓漕粮，就是把从东南各省征来的粮食，由运河运往北京，以供官员和军队消耗。这是一首写实的诗，它通过对东南赋粮压榨的典型，揭示出那时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。因此，诗人早就忧心忡忡（音充 chōng）地喊道："起视其世，'乱'亦竟不远矣！"预告农民反抗的大风暴又将来临，向清朝统治者敲起了警钟。

经过鸦片战争，在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，中国社会的矛盾发展了，危机加深了。

在鸦片战争中，英国侵略者强抢勒索，单白银一项，在各

地就抢去不少，最后还夺取了二千一百万元的巨额赔款。如果加上侵略军的掳掠破坏和清朝政府支付的战费，为数就更大了。这些突如其来的负担，不是直接取之于人民，就是间接转嫁到人民头上。

鸦片的流毒，战前已很严重，鸦片战争就是由贩烟和禁烟的斗争开始的。战后，英、美侵略者公然以香港为贩毒基地，向中国沿海各口倾泻鸦片，数量年年增加，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每年激增至五、六万箱。鸦片用现银交易，每年流出的白银达二、三千万两。洪秀全起义时，痛斥清朝政府"每年花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"，以有用之钱，换害人之物，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。

由于白银大量外流，银价上涨、钱价下跌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起来。白银与铜钱的比价，原来是每两换钱一千文左右，到一八四〇年每两换钱为一千六百文上下，到一八五〇年竟可换上二千二、三百文了，比原来上涨了一倍多。而农民、手工业者出卖劳动力和零售产品，是按钱文计算的，收入没有什么增加；他们缴纳赋税的时候，却要把铜钱换成白银，或者按银折算，赋额即使照旧，实际负担已经增加了一倍多。如果把抬高银价和浮收等情事算进去，往往赋银一两，人民要费去八、九千文以至十千文以上的铜钱，比起"国赋三升民一斗"来，又高出了许多。

五口通商后，洋纱洋布等消费品不断涌来，例如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：一八四二年为九六九、三八一镑，一八四五年上升为二、三九四、八二七镑，其中棉纱总值是九九、九五八

镑，棉布总值是一、六三五、一八三镑。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抵制，以及鸦片换走大量白银对一般贸易的影响，此后几年一般对外贸易有所下降。但是外国纱布的输入，却排挤了中国的土纱土布，夺去了中国手工业产品的市场。一八四五年就有人指出这种情况，说："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"，"闽产之土布亦因之壅(音拥 yōng)滞不能出口"。江苏的松江、太仓一带，本来是手工纺纱织布业最发达的地方，这时也已"销减大半"。这种影响，由沿海、沿江逐步推向内地，中国旧有的社会经济遭到破坏，手工业日趋衰落，向工场发展的道路被阻塞了，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失业。

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，马克思在当时就已深刻地指出，他说："**中国在 1840 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，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，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，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，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，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：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，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。**"①

旧税捐加新税捐，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封建统治者的压榨，在鸦片战争后造成的普遍现象。清朝政府为了偿付赔款和解决银荒，不仅用摊赔、代赔等名目向各省搜括，还以"筹划经费"的名义，进行加赋加价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。地丁税是清朝政府压榨人民的主要项目，占其总收入的四分之

---

① 马克思：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九卷，第一一一页。

三，从一八四一到一八四九年增加了三百几十万两。食盐是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，长芦盐原定官价每斤十六文至二十四文，一八四六年距产地近的涨价至三十三、四文，距产地远的涨价至六、七十文。各种税捐，通过银钱折价和官吏勒索，人民的实际负担，都是额定的几倍或十倍以上。人民缴纳不起，州县的催逼急如星火，关押拷打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连反动官僚曾国藩（音凡 fán），在一八五〇年也承认这种情况是“吏役四出，昼夜追比，鞭扑满堂，血肉狼藉”。

封建社会里，掠夺土地和通过土地进行掠夺，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基本手段。鸦片战争前几十年，已有人指出，“兼并之家，一人据百人之屋，一户占百户之田”，土地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，多数人却在贫困中煎熬。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剧烈冲击，官吏更加贪婪（音兰 lán），百般搜括现银；地主不断扩大货币地租和提高押租，吸取现银；富商、高利贷者则利用银货折价和放印子钱，进行重重盘剥。在这些吸血鬼的压榨下，广大农民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耕地，变为赤贫，连一些小地主也濒于破落，土地为少数人占有的集中程度，达到了高峰。当时苏州府的常熟、昭文（后并入常熟）两县，小户的田产，多卖与“富豪强梗”的大户，这一趋势，当时有人说“犹水之就下，急不可遏（音扼 è）”。山东章丘县孟家地主，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间，前后七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，而一八四〇至一八五〇年间，先后十五次共买进土地一百九十六亩多。广西桂平、贵县、平南、象州、陆川等地，大部分土地被大地主霸占，有一批占地几百亩

至几千亩，收租谷几十万斤至上百万斤的地主。这些情况，可以作为全国的缩影，当时拥有三千亩以上土地的地主，几乎到处都有，甚至有拥田万亩、十万亩、百万亩的大地主存在。所以，全国百分之七、八十的土地，集中在占少数人口的地主阶级手里。

所有这些现象，表明那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空前激化。这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，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造成。一处天地会起义的布告说："天下贪官，甚于强盗；衙门酷吏，无异虎狼。富贵者纵恶不究，贫穷者有冤莫伸。民之财尽矣，民之苦极矣。"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，更在他的自述中说："自和番（指清朝政府向英国投降，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）之后，吹烟更多，番货涌涌而来，百姓不知何由。看到各处设关设卡，官府押制从番，世界大变，大家无银可使，无饭可食，人人拜隘（广东话，愁闷的意思）。"他们以切身经历，用简明的语言，说出了人民和统治者的根本对立以及矛盾的根源。

那里有压迫，那里就有反抗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，各地农民和手工业者都纷纷揭竿而起，少数民族也群起反抗。十年间，从抗捐、抗租、抗粮，到攻城占地、打江山的大小起义，计有一百多次。这些起义，大多数都是由会党一类民间组织策动的，如北方各省的白莲教、天理教，河南、安徽、山东一带的捻（音碾 niǎn）党，四川、湖南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等省的斋教。而天地会的势力更盛，几乎遍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，由它发动的起义，也最为频繁。会党是早已在民间流行的反抗力量，但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在鸦片战争后特别活跃起来，证明压迫大反抗力量也就愈大，压迫是驱使群众走向革命的条件。

各地掀起的武装起义，以广西、广东、湖南三省比较突出，声势最盛，广西并且很快成为反抗力量汇合的基地。因为这三省在鸦片战争中的激荡很大，除了广东直接遭受战火侵害外，清朝政府从三省征调的兵力最多，战后裁遣，许多士兵流散于这个地区。这里，长期以来又是天地会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活动的地区，失业群众和遣散士兵，无家可归，大都投入天地会，天地会的山堂大大发展起来。加上连年灾荒，成千上万的饥民，流离失所，也卷入了斗争的行列。所以，三省不断地燃烧起反抗的怒火，而广西是清朝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，火焰汇集到这里，就越烧越旺，日益形成为燎原之势。三省的重要起义有：

一八四三年，湖南武冈曾如炷(音注 zhù)占据洪崖洞起义。

一八四四年，湖南耒(音垒 lěi)阳阳大鹏率领两千余人起义，持械攻城。

一八四五年，广西藤县邓立奇、钟敬敏率领群众在赤水墟(音须 xū)起义；广东香山(今中山)、新会、顺德等处农民连续暴动。

一八四六年，湖南新田王宗献起义，广东北流也发生农民反抗斗争。

一八四七年，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雷再浩和广西全州李世德，在湘、桂边境发动起义，进攻全州，同清军战斗了两个月，广西、湖南的天地会纷纷响应。

一八四八年，广西天地会起义出现了高潮。张嘉祥在横山起义，活动于粤、桂边境的钦州、灵山、贵县、横山等地，队伍发展到万余人。张嘉祥后来投降清军，成为地主阶级的鹰犬。陈亚贵联合广东钦州、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几千人在武宣起义，一度攻破广西中部的修仁、荔浦两座县城，其后转战象州、武宣、贵县等地，一直战斗到太平军起义爆发以后。张钊等率领艇军在梧州起义。这支起义军长于水战，曾经控制了广西的主要水道。

一八四九年，雷再浩的部下李沅发，在雷再浩牺牲后，率领所部又在湖南新化起义，攻破县城，杀县官，开仓库，砸监狱，大杀地主阶级的威风。随后转战湘、桂边境的高山丛林中，打败了地主团练（镇压农民的地主武装）的围攻，队伍扩大到四、五千人，进入广西，战斗于融县、永宁、永福、阳朔、荔浦、修仁等处。这年，广西发生大灾荒，饥民千百成群，无路可走，纷纷同天地会汇合，打出“官逼民反”、“替天行道”、“劫富济贫”等旗号，攻占城池，多至数十起，各有数百人、数千人不等。李沅发是影响较大的一支。

到一八五〇年和一八五一年间，广西的革命形势吓坏了反动统治阶级，官绅上告，皇帝“查问”，嚷成一片。他们惊呼“广西盗贼充斥，蔓延最盛”，达二、三十股，还“有尚弟会匪，啸聚万人”的可怕力量。这个“尚弟会”，就是指洪秀全领导的革命组织——拜上帝会。

二、洪秀全和拜上帝会

洪秀全，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坳村的一个农民家里。官禄坳村在广州北面，离广州城约百里。他童年一边伴随父兄劳作，一边读书，十八岁开始充当村里的私塾教师，是一个深知民间疾苦，同贫苦农民有血肉联系的乡村知识分子。他曾多次去广州考秀才，都没有考上，精神上受了不少折磨。而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，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严重后果，到处都在激起人民的反抗，这些更给予洪秀全以极大的震动，把他一步步引向革命的道路。

“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”① 洪秀全就是一个最早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。

早在鸦片战争前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，就已进入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活动。商人带来了鸦片，传教士则带来了精神的鸦片——基督教，广州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地方。

一八三六年，洪秀全在广州应试出场，遇到传教士在街头

---

① 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第一三五八页。

传道，散发宗教书册，他得到一部基督教的传道书——《劝世良言》。这部传道书是一个中国教徒梁发编的，梁发原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助手。在这以前，来中国的传教士都属于天主教派，马礼逊是到中国来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。他于一八〇七年到广州，来往于澳门、麻六甲等地。为了利用宗教向中国进行侵略活动，他学习中文，把新约、旧约（圣经）用中文翻译出来，是圣经最早的一个中文全译本。《劝世良言》从这个译本中摘引若干段落和故事，加以解释发挥，印成九个分册，近十万字。洪秀全把《劝世良言》带回家中，翻阅后就丢开了。次年，洪秀全再试落第，愤世嫉俗的情绪越发不能抑止，大病一场，病中若梦若狂，假托上帝痛斥孔子，说"妖魔作怪"，总由"孔丘教人之书多错"，有时大呼"斩妖，斩妖，斩呀，斩呀！"并吟作了"手握乾坤杀伐权，斩邪留正解民悬"的诗句。洪秀全的思想和基督教开始在这里发生联系，这种联系不过是借用上帝的名义，宣告自己受命于天，负有特殊使命，为将来干"斩邪留正"、打破人世间不平的革命事业，进行精神准备。

此后数年，洪秀全仍在乡下教书，以维持生活。一八四三年，他最后参加了一次令人憎恨的科举考试。这时，刚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久，清朝政府军事、政治上的腐败已暴露无遗，他从此与封建的科举仕途完全决裂，立志要推翻清朝的统治。"暂且偷闲跃在渊"，"等待风云齐聚会"等诗句，又写出了他一待时机成熟，就要投身革命的胸怀。他记起了那部久被搁置的《劝世良言》，检出来与同学冯云山、族弟洪仁玕一起看，

想从中找出一些名堂来。书中渲染的宗教洗礼，却给他们提供了进行组织的借鉴，在家乡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最早的一个小组。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(上帝)之子、基督(耶稣)之弟，下降凡间，拯救世人。冯云山也是花县一个村塾教师，从此与洪秀全结为战友，成为拜上帝会的组织者。

《劝世良言》同基督教其他的传道书一样，无非是劝人崇拜那个捏造出来的"造物主"、"独一真神"——上帝，宣扬"地上无实福，天上才有福"，要"爱尔仇"(爱你的仇敌)等等，用以麻痹人们对现实世界(剥削阶级统治的世界)的反抗意志，教人去追求彼岸世界(所谓天堂)的幸福。可是，洪秀全却从宗教说教中，得到了相反的启示。他认为，既然除上帝之外，其他被人们崇拜的偶像是妖魔，那末为什么农民不可以站到"上帝"的一边，向孔子、阎罗王、皇帝等妖魔宣战呢？既然一切人都是"上帝"的子女，都是"平等"的，那末为什么农民不应该起来为自己被剥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呢？可见，拜上帝会虽然带有宗教色彩，但剥去它的神秘化外衣，不容置辩是一个革命组织。它揭示了与宗教背道而驰的斗争哲学。

所以，洪秀全写的许多诗歌，不是为上帝唱赞美诗，而是发抒自己的革命顽强斗志，例如：

"手持三尺定山河，四海为家共饮和。
擒尽妖邪归地网，收残奸究(音轨 guǐ)落天罗。
东南西北敦皇极，日月星辰奏凯歌。
虎啸龙吟光世界，太平一统乐如何！"

这是说江山要用宝剑去开辟，只有"擒尽妖邪"、"收残奸究"，

才能出现“四海为家共饮和”的“太平一统”世界，幸福是要通过斗争来实现的。他铸了长约三尺的宝剑，刻上“斩妖剑”三个字，随身佩带。上面的第一句诗，就是以写实来显示他的决心的。接着，他打碎了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，不顾那些乡绅族老的非难，向两千多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思想权威挑战，勇敢地迈出了战斗的第一步。

一八四四年春，洪秀全偕同冯云山等前往外地活动，沿途藉贩卖笔墨补贴费用。历经广州、顺德、南海、番禺、增城、从化、清远、英德、函江、阳山、连山等地，西入广西桂平、贵县一带。他们在贵县赐谷村努力工作了几个月，吸收信徒百余人。这是洪秀全、冯云山初入广西为太平军播下的第一批革命种子。洪秀全得知赐谷村附近的六乌（亦作六窠）山，有座六乌庙，奉祀一男一女妖神。他又以诗歌为斗争武器，题诗申斥六乌神为“该诛该灭两妖魔”，引导群众向牛鬼蛇神开火。这年冬天，洪秀全因为在广西一时还打不开大的局面，返回广东，冯云山则仍留广西活动。

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，洪秀全在蛰居家乡、继续教书期间，先后写了《原道救世歌》《原道醒世训》《原道觉世训》等宣传革命的文献。

在这些文献中，洪秀全从农民的革命要求出发，吸取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“平等”思想，并把它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揉合起来。洪秀全揭露当世的黑暗：“所爱所憎，一出于私”，对古代关于大同社会的描写表示向往。把相亲相爱的理想社会，与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实世界相对照，表示对现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